

费孝通文集

第二卷

群言出版社

费孝通文集

第二卷
1938 ~ 1941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文集 第2卷

/费孝通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0

ISBN 7-80080-242-6

I. 费…

Ⅱ. 费…

Ⅲ. 费孝通-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063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深圳时代设计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89 × 1194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5 插页 36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深圳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G · 135 定价:28.00 元

DI23/02

编者的话

本卷收录的文章多写于 30 年代后期和 40 年代初。这段时间，作者已从英国留学归来，并获得伦敦大学哲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同时被聘为云南燕京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和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被社会学界誉为“经典”之作的《江村经济》一书在英国问世，并被作者的导师，也是当时社会人类学的泰斗人物马林诺斯基称之“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从而奠定了作者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本卷中的《禄村农田》等文章，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著作。但由于正值抗战期间，作者居于西南一隅，该书直到 1943 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得以印行。

我们在本卷文章的编排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同时对文章进行了资料核对和校勘，除对个别文字进行订正外，一般不作改动。为了读者在阅读上的方便，我们在原有注释的基础上补充了必要的编辑说明。

1999 年 3 月

文集前记

在我这一生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前,也就是在我走过 90 岁这个年限之后,我的亲友们建议把我过去一生所公开发表过的写作整理成一部文集,作为纪念。我同意他们的好意,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有不少已预定的课题还要完成,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帮助他们做这项工作。我只能表示尽力支持他们而已,又只能放手和放权让他们去办。最近他们已经把这部文集初步编成,将要去付印出版,坚持要我在集前说几句话。我表示同意,所以简要的把我想在集前说的话写下。

我同意把我一生公开发表过的写作力求完整地编成一部文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为一些愿意想了解我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怎样走过来的人提供一些研究的素材。我的一生从 20 世纪初期到它的结束,经过了 90 个年头,这段历史给了我这一生经历的内容。由于我自己喜欢写作,所以我也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些文字上的痕迹,反映了我这段时间里社会对我所起的作用,同时多少也透露了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写作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为一生兴趣的人,我以己度人,想到我身后也许还会有和我一样有此同好的人,我愿意把我要留下的这本文集提供他们做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素材。也想以此作为我对我一生所受社会培育的一些回报。

为了贯彻我这个意愿，所以我一再向负责整理和编辑这部文集的亲友们说明，我愿意授权他们尽力搜集和如实地处理我一生留下的写作，把它们保留下去，而且尽可能全部编印出来，有待今后读者的取用。

但在这里我也得作一点保留意见。因为我一生中有一段时期曾经被划为“右派”，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不得不写下一些言不由衷、不符合我实际意识的文字，就是那些被迫写出的“检讨”和“交代”。这些文字要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经过的素材，是可以有用的，而且也可以说是有意義的，但需要如实地放进当时很特殊的和失常的社会情境之中去，才能明白其实的意义。现在已事过 20 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的作用。所以我再三考虑，还是要求把这一部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我愿意在此声明这个保留意见是我自己作出的，我也愿意为此负责。

我同意编者以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来编排在文集中前后的次序，我认为既以提供研究素材为目的，所以为了便于追索我一生思想的发展和经过，采取按这些文章发表的前后来编排定在文集内的先后次序最为方便可行，但是事实上我是又有多题并进的思考习惯，不同题目的思想可以在同一段时间里参差进行。而且文章的完稿和发表之间又有不同的差距，我的文章又经常在同一时间里投向不同的刊物，发表时间和写作时间又不一定相符。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引起了文集编者的一些困难，不可能坚持上述的原则。同时也必然会使一般读者不能按文章编排的先后顺序来追索我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在文集的编排上还有一个引起编者为难的原因是我在写作上常采取化整为散又集散为整的方法。就是一个课题时常分作了系列的短篇写出，一般是在一个刊物上连续发表，积有一定篇幅，再编成一卷作为专集出版。凡是已经以专集方式出版过的一系列文章，我建议在本文集里还是予以保留使文章内容的连续性不要拆散。这里又发生了一个编排上的难点，就是那些已结合成专集的文章，各篇发表的前后的间隙中我又时常插进另一个新的系列。逢到这个困难，我建议这本文集的编者只好让前后为序的原则作出些让步了。

我要感谢本文集的整编者为此项工作所费的劳动和精力。我认为他们把分散在各地各种报章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收集起来确已竭尽了全力。要想做到把我一生全部写作都搜集到手困难很多。我的记忆中早年有一些常发表我文章的杂志和刊物，现在已经因各种原因，无法找到了。又比如我最早投稿的《少年》还是友人从僻偏的图书馆里找到的，而当时我曾用“费北”的笔名在这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却没有复制给我。又比如我在中学毕业时所编的《水苻》中发表的早年作品，还是友人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中偶然见到而复制寄我的。至于我在昆明学生运动前后所发表在许多街头刊物上的文章，为数不少，现在已搜集不到了。

最后我应当感谢这本文集的编者，他们不仅费了大力去搜集我散失的写作，而且又费了大力去校核所搜到的文章的复印件和原刊里的错字和失误。我嘱咐他们的一条原则是凡不属于显而易见排印上的错失，一律存旧。因为在这段虽则不算长的时间里，一般通行语文的用辞也有相当的变化。近时已不常见的辞汇，在几十年前会是常见的，而各人所用辞也存在着个人的习

性,所以现在看来不太顺眼的辞汇不宜改动。但在校核过程中确是发现不少出于作者的错失或疏忽,以致文章内容中有实质的错误,使前后所提的事实对不上口,甚至有矛盾,在数字上又有出入。这些错误应当由作者来负责的。我十分感激编者对我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能发现这些错误,使我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把这些错误予以公开纠正。所以我请求编者凡逢到这类情形,应当按照原文不加修饰地予以付印,并加注说明错误所在,千万不可掩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一言既出,驰马难追。人生不可能无过,有过则改,坦白不讳,就对得起读者了。如果文章中还有错失没有揭露之处,祈望今后读者继续纠正。我即在九天之上,也将表示感激。

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和顺性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至今我还是这样做。这是因为我相信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应有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当然一个人所有的思想无不受当时社会的陶冶。他的一言一行无不是社会集体藉以交流和进行集体行为的方式。社会集体就是通过其成员的言行达到它的创新和发展。所以一人的言行虽系个人之事,但也受到这个人所参与的社会,包括社会的历史遗产和当时群众思想的交流的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它表现社会的一面。我有时也乐于反复重读我过去的写作,常常以此作为我所处时代的一些纪录影片来自娱。我也希望能以此提供给读者同享。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同意我的亲友们提出整编这部文集的建议。在这部文集中也保留了一些我这一生未能实现的梦,和具体的有关研究社会的思路和此生未获申论的课题。如

果此书能对一些后来者发生一点启发的作用，因而能继续进行发挥和发展，这将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了。后世不乏比我更有才能和学力、具备更好研究条件的人，希望能从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获得更大的成就，于国于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将为此而感到没有辜负此生的激情于地下。念人世的茫茫，愿以无悔无憾而告终。谨此写下这本文集的前言以告读者，并再次表示对编整和支援这本文集的亲友们的感激。

黄青田

1999年3月28日于锡州宾馆



30年代的费孝通

目 录

江村经济	(1)
禄村农田	(221)
农村里的囤米	(433)
患土地饥饿症者	(439)
农家费用的分析	(445)
娱乐？工作？	(451)
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	(458)
农贷方式的检讨	(464)
劳工的社会地位	(469)
消遣经济	(475)

江村经济*

——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

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第一章 前言

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籍，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此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在分析这些问题时，它将说明地区因素的重要性并提供实事的例子。

这种研究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

-
- * 本文是作者 1938 年根据在家乡农村的调查材料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1939 年出版。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 1984 年作者才委托戴可景同志翻译成中文。

作者的老师布·马林诺斯基教授在作序时曾预言本文“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并对中国的社会学界给予了很高评价。现将该序一并附在文后以供参考。

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

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过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对我们观察的这个村庄的经济问题，只有在考虑到两方面的情况时才能有所理解，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另一方面是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对任何一方面的低估都将曲解真实的情况。此外，正如我们将在以后的描述中所看到的，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实事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此。

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文化。一个人如果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获取一件新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更加适用。所以，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实事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并不总是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许多力量的产物。所以，新工具最后也可能被证明是不适合于人们的目的。

对社会制度要完成一个成功的变革是更加困难了。当一种制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甚至可能还没有替代它的其他制

度。困难在于社会制度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只有通过一致行动才能改变它，而一致行动不是一下子就组织得起来的。另外，社会情况通常是复杂的，参与改革的一个个人，他们的期望也可以各不相同。所以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为组织集体行动，对社会情况需要有一个多少为大家所接受的分析和定义以及一个系统的计划。这种准备活动一般都需要一种语言形式。最简单的形式如一个船长在指挥一条船航行时，对他的船员们发出命令。又如在议会或国会里进行一场有准备的辩论。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同解释和关于结果的各种期望形成辩论的中心。无论如何，这样的准备活动总是会在有组织的革新活动中出现的。

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它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后果。本书有许多例子说明了对情况或形势的实事求是的阐述或分析的重要性。下面我想先提几个例子：在亲属组织中，目前法律对财产继承问题的规定似已成为两性不平等的实例。一旦男女平等的思想被接受，这样的规定将产生一种修改单方亲属原则的行动。正如我要说明的，财产的继承是两代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部分。供养老人的义务，落在子女身上的社会里。在目前父居家庭的婚姻制度下，女儿和儿子不能分担同等的义务。因此，双系继承与单方立嗣相结合将形成两性的不平等。从这一点来看，立法的后果显然与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四章六节）。

有时，对情况或形势的阐明或分析可能是正确的，但不完整。例如，在缫丝工业中，改革者主要从技术方面来分析情况，忽略了在丝价下降中国际贸易的因素，这就导致多年来，对村民许下的从工业中增加收入的诺言，未能实现（十一章八节）。

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

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

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大家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些基本措施,在中国人中间应该没有政治上的分歧。分歧之处是由于对事实的误述或歪曲。对人民实际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助于使这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

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一群懂得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的中国青年学生们的初步尝试。在福建、山东、山西、河北和广西都开展了同样的研究。将来还会有更广泛的、组织得更好的力量,继续进行研究。我不太愿意把这本不成熟的书拿出来,它之所以不成熟,是因为日本人占领并破坏了我所描述的村庄,我被剥夺了在近期做进一步的实地调查的机会。但我还是要把本书贡献出来,希望它能为西方读者提供一幅现实的画面,这就是: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我并不悲观,但肯定地说这是一场长期而严重的斗争。我们已做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承受比日本的炸弹和毒气还会更坏的情况。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第二章 调查区域

一、调查区域的界定

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

A. 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吴文藻博士和雷蒙德·弗思博士^①曾经讨论过这个基本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在这种研究的最初阶段,把一个村子作为单位最为合适。弗思博士说,应当“以一个村作研究中心来考察这村居民相互间的关系,如亲属的词汇、权力的分配、经济的组织、宗教的皈依以及其他种种社会联系,并进而观察这种种社会关系如何相互影响,如何综合以决定这社区的合作生活。从这研究中心循着亲属系统、经济往来、社会合作等路线,推广我们的研究范围到邻近村落以及市镇。”

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

① A. 拉德克利夫-布朗(A. Radcliffe-Brown)教授于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学就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的问题作了讲演;接着,吴文藻博士在天津《益世报》的《社会研究》周刊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近来,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博士在《中国农村社会团结性的研究》一文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此文刊登在《社会学界》第10卷中。

这样一个村庄并没有正式进入保甲制。保甲制是中国的一种新的行政体制，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人为地设置的（六章五节）。开弦弓村在1935年才有这种制度。因此很难说得清，这种法律上的保甲单位，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以其不断增长的行政职能取代现存的事实上的群体。但目前，在实施过程中，保甲制仍然大多流于形式。因此，我们所研究的单位必须是实际存在的职能单位——村庄。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人民的生活。

在目前阶段的调查中，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这并不是说村庄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生活中尤为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上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中。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已经到达了非常边远的村庄。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压力是目前中国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那么在这样一个小的地区，在一个村庄里搞实地调查，对于这种外来力量及其所引起的变迁会取得什么进一步的了解呢？

显然，身处村庄的调查者不可能用宏观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外来势力的各种影响。例如，由于世界经济萧条及丝绸工业中广泛的技术改革引起了国际市场上土产生丝价格的下跌，进而引起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口粮短缺、婚期推迟以及家庭工业的部分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实地调查者必须尽可能全面地记录外来势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但他当然应该把对这些势力本身的进一步分析留给其他学科去完成。调查者应承认这些事实，并且尽力约束自己去跟踪那些可以从村庄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影响。

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好方法。